

粵港1942

南石头大屠杀

谭元亨 著

纪念死于侵华日军细菌武器下的
东方奥斯维辛——南石头难民所粤港难民
揭露日军华南「波」字第8604部队犯下的
两大反人类罪行——细菌战和大屠杀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粵港1942

南石头大屠杀

谭元亨
著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粤港 1942 : 南石头大屠杀 / 谭元亨著 . — 北京 :
西苑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151-0500-0

I . ① 粤… II . ① 谭… III . ①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3360 号

粤港 1942

——南石头大屠杀

作 者 谭元亨
责任编辑 李 涛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政编码 100102
电 话 010-57280420
传 真 010-88637120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0.75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500-0
定 价 39.80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我们为什么把德国法西斯使用毒气在奥斯维辛等集中营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的血腥事件，视为“大屠杀”而非毒气战，是因为其对象是手无寸铁的无辜老百姓。那么，当日本法西斯运用细菌，在南石头难民所等处杀害了上十万粤港难民之际，我们同样应把这一事件视为“大屠杀”，而不能称之为“细菌战”。因为其杀害的对象，更清一色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的难民，尤其是香港沦陷之后被迫“疏散”回广州的难民。

因此，过去在我们曾有过的调研和历史报告中，把南石头大屠杀说成是“细菌战”，显然是没有抓住这一事件反人类的实质。经过进一步的深入调查与研究，今天，我们终于有充足的理由，把发生在广州南石头的灭绝事件，视为日本法西斯的大屠杀罪行。这对于日本法西斯而言，则是更无法抵赖的了。毕竟，在南石头这方寸之地，不曾发生过什么战争，也不曾响起过反抗的枪声，上十万或许更多的香港、广州难民，是在寂寂无声中被屠杀、被虐杀的，其手段更令人发指。尤其是与之相关联的活体解剖，其残忍程度，可谓登峰造极。而细菌战，则同时为同一支日军细菌部队在广州进行，制造了大量的鼠疫菌种并进行活体解剖。因此，细菌战与大屠杀两项罪行都占全了。

这是人类屠杀史上最黑暗也最恐怖的事件。它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大屠杀——不同于圣巴托罗缪之夜对异教徒的、出于信仰上分歧的大屠杀，也不同于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大陆上印第安人乃至玛雅人的、出于狂妄与掠夺的大屠杀，甚至也不同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出于被煽动起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当然，它具有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全部特征。它是侵略者，以暴力攫取了占领权之际，以手中

无辜平民的大屠杀事实，也更被严密地封锁了起来。南石头大屠杀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战后近半个世纪，居然被瞒得铁桶一般。

因此，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把这一大屠杀的罪行予以揭露，让全世界人民了解日本法西斯的罪行。



▶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日军进驻广州。

因为它正处于被日本法西斯自1938年侵占后三年，已治理成的“皇道乐土”的广州近郊。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皇道乐土”当中无声的大屠杀。而这更集中地体现出其对人类的生存尊严的蔑视，对人类正义与持续的蔑视。如果说，发现在欧洲大陆上法西斯分子的屠犹，尚与徘徊在那片大陆上反犹排犹上千年的阴魂不无关系，那么，曾上千年间视中国为其文化发祥地的日本人，又从何处去寻找其屠杀中国人的历史渊源？有人说，这是那种非理性的“武士道”精神。可是，使用细菌进行大屠杀，做了那么多的严格的科学实验，甚至进行工厂式的鼠疫菌的批量生产，以及在南石头精心计算过的投放沙门氏菌的温度、时间种种，哪一样不是够理性化的了。尤其投入者中，更有那么多博士、教授、医生。理性的杀人，与非理性的杀人，是无法比拟的，

因为一杀，便是数以万计、十万计，乃至百万计，批量的，大规模的，持续的，且……杀人不眨眼，只要简单地一按按钮，或画个圈，没有负罪感，更不用直面谁。抵赖起来，还可以振振有词——不妨看看主持南石头大屠杀的佐藤俊二的交代及证词，那么煞有介事，不动声色，便轻松地隐蔽住了主要的罪行。

尤其是走向细菌战。

世界公认，细菌战、大屠杀、慰安妇等，是最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的重大罪行。法西斯德国，正是通过技术路线与理性手段进行有组织的屠杀，600万犹太人就是这样在奥斯维辛等集中营中“人间蒸发”的。集中营并没有把犹太人视为有生命的同类，一个同样拥有生存权利、有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同类，而只是视为一件件的实验品、废料、垃圾，这才有一座座作为“杀人工厂”的建立。而上百万死于细菌战的中国人，在日本法西斯的眼中，也同样不是一个个拥有生存权利，享有生活情趣、活泼的想象力与无限创造力的生命，而只是“马鲁大”——圆木，“731”是这么称呼被活体解剖的对象，至于上十万死于南石头难民所的粤港难民，又被视作什么——一个已被治理为“皇道乐土”的城市的累赘，一个不堪负担的食品消耗链条……总而言之，当彻底地将其消灭于无形之中。

“波”字8604部队的细菌战与大屠杀罪行之所以能隐瞒得那么久，一是其组织的严密性，控制的冷酷；二是其罪魁祸首们“坚不吐实”——其实，他们内心仍清醒地、理智地认识到这样的罪行是多么可怕，所以才百般隐瞒、推诿、回避，避重就轻！

是的，这一批人，没有一个不是高智商的医学专家。广州“波”字8604部队的部队长佐藤俊二，学历还是博士——显然，在杀人的本领与技巧上，他当可再封上一个“博士”，那种下令从本部取来杀人毒菌的冷静，那种在审判席上伪装无辜的从容，当是理性的表现。但愈是这样的理性杀人，其罪恶就更巨大，其行为就更无耻。

他们，当是人类理性的耻辱！

“波”字 8604 部队细菌战罪行的半个多世纪成功的隐瞒，与整个日本社会对于那场侵略战争全然没有反省，且容不得反省的人是相一致的，刻意的隐瞒与拒绝反省，本就是历史逻辑的一致。

在日本人野田正彰所著的《战争与罪责》一书中，谈到“日本的战后医学同战时直接相连，对过去没有进行丝毫反省。例如在中国展开细菌战，进行人体活体实验的陆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有关人员，战后却成了医学系的教授（京都大学、京都府立医科大学）、公立医院的院长，或是在行政卫生部门供职，建立了像‘绿十字’那样的血液制药会社。不尊重个人的传统，仍然被发生了艾滋丑闻的‘绿十字’的企业文化，被厚生省和医疗工作者相互勾结而承继着”。而这个“绿十字”后来更与厚生省结合为一体，成为一个血液制剂的消费大国。其前身“日本血库”的创始人，则是当年 731 部队搞活体解剖，人体实验的中枢人物。艾滋丑闻，则是他们进口未加热处理的血液制剂引发了艾滋病。

这无疑是相当典型的实用理性，当年借助罪行而进行的“科学实验”，已用于战后创造经济效益的企业运作的生意之中了，以致发生艾滋丑闻。当然，美国人是早已看到了这一点，这才有当年作为日本占领军长官麦克阿瑟的密电：

731 部队的细菌资料对于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上的价值，远远比利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战争犯罪更重要。

尽管后来具体实施这一“赦免”的美军代表默里·桑德斯上校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现在看来，当初放纵那批犯了罪的日本人是一个错误。”美国人谢尔顿·H·哈里斯完成了《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美国司法部亦禁止日本臭名昭著的 731 部队涉嫌对人类犯有罪行的日本罪犯入境……可这毕竟已太迟了。

日本国内早已有人毫无罪感地宣称：“用活人做试验品，促进了

日本医学的进步。”至于那位不仅逃脱了惩罚，而且逃脱了审判，一直逍遥法外的细菌战之罪魁祸首——石井四郎，当日就是这么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如果以文书形式保证他及手下可以免除战犯追诉，他愿意提供细菌作战的细节资料。”

他如愿以偿了。

后来，在不同的场合，乃至集会上，他都宣称：“是细菌部队拯救了日本国家。”这里用的是“拯救了”这一完成式。那么，这句话背后，究竟包含有什么意思呢？作为战争当中，细菌部队起到了“拯救了日本国家”的作用，还是战后，由于细菌资料的交易，“拯救了日本国家”呢？不管是之中，还是战后，“拯救”的作用是完成了的。

这段话，是相当自负也相当理性的。他之所以发动细菌战，是

有着明确的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必需手段，而这所借助的，则是现代的科技，为了“医学的进步”，从而发动战争，使用战俘或难民来进行活体解剖，获得科学的数据及临床经验——这是何等清晰的理性审视，似乎纯粹是一种职业，不受任何道德与法律的限制。



► 奥斯维辛集中营死难者留下的眼镜如此之多，令人恐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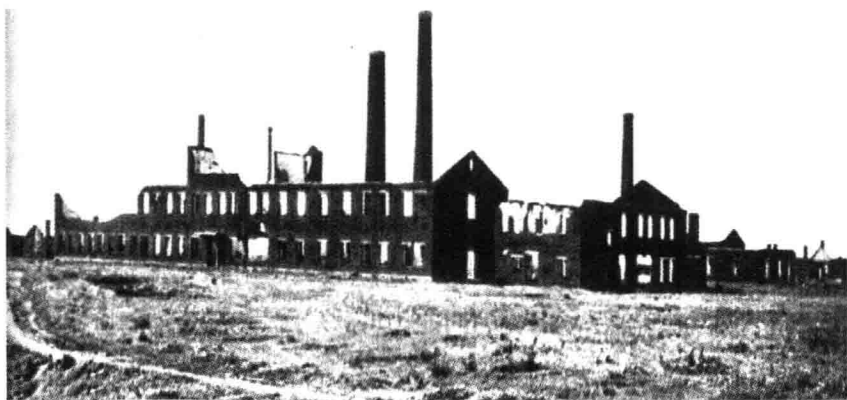
战后，一些西方学者，很是关心工业国家里控制模式的变化，并主张社会应控制对人们身体压迫手段的运用。他们主张精心建立有关工作量调控

的系统，而这种“精心建立的调控”，则会左右人的意识并浸透到日常生活中，从而规范着人的行为。这种控制，被视为“理念的极权”。而细菌战本身，当是这种精心建立的调控之示范，它务必拥有科学精神，严谨、周密，运算与试验，都应当一丝不苟。当然，事先得有一个精心筹划的科学方案——这种理性的杀人，比狂怒之下非理性的杀人，无疑更为可怕，因为所杀的不再是单个的人，而是有组织的屠杀，且无须承担任何道义与良心的责任。



▶ 苏联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看到的幸存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对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对日本侵略者的细菌战，都使用了同一个名词——“杀人工厂”，一种工业化的屠杀工序。



▶ 日军 100 细菌部队在长春市郊建立的细菌工厂，他们在这里生产了大量的羊痘、牛痘、炭疽热等多种传染病的细菌。

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在近现代工业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严谨、刻板，讲究技术与效率，都是值得钦佩的。但是，这种技术与效率，用于战争，尤其是用于“杀人工厂”——集中营与细菌战，其后果则是非常骇人的。我们不禁要问，在如此先进的现代手段的背后，亢奋的又是怎样一个狰狞的灵魂？

那种子为父隐，后人为前人掩盖劣行；那种道德谎言，为维护所谓国家或民族而不惜撒下的弥天大谎种种，只有极权主义国家、封建专制下方可以有的，那么，在由麦克阿瑟强行推行民主化了的日本，为何仍会有如此种种类似现象呢？

在民主化背后，仍是贵族政体、僭主政体乃至骨子里的专制政体？美国原驻日大使赖肖尔在《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中称：“对独裁权力乃至领袖权威的反感和对群体合作的强烈偏爱，构成了日本政治遗产的特征。”这多少对日本是有所了解，但可惜他对整个的东方专制主义缺乏更广泛的研究，他对“群体合作的强烈偏爱”之实质仍缺乏了解，要知道，所谓的“民主集中”便是这种“合作”的另一种描绘，其导致的则是“集体专制”，这同“理念的极权”并无二致。换句话说，保留了天皇制下的日本，其文化的内核，仍旧是一种病态的专制色彩。日本不可能完全走西方民主化的道路，东方的胎记是无法抹掉的，当今日本政府的处事模式，东方人一看就一目了然。表面上的技术现代化，永远也盖不住骨子里的文化极权。这才有今天与当日被其侵略的国家无法协调的结果。似乎没有一位独裁者，可他们心目中仍有一位不可替代的虚拟的“至上者”，如同《一九八四》中无法确定其是否存在的“老大哥”。

《战争与罪责》一书中，有一段颇值得玩味的话：日本面对战败一种反应是“无罚化”，“不想正视自己做过什么，失去了什么”，“另一种反应是由崇尚精神转而崇尚物质，用唯物的价值观掩盖战争的心理创伤，认为是物质力量不够而输给了美国，于是要通过经济复兴，重建工业，赶超美国经济而重新站立起来。这其中，隐藏着不承认自己

精神颓废，不承认在中国文明前败北的固执，还隐藏着战争中极端精神主义的反作用而导致的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不是合理的、协调的经济主义，而是极端精神主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的经济至上主义。这不过是把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移向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认为物质的富裕就是一切”。

作者并非理论家，但这一分析，同我文前说的外表与内核，可谓异曲同工。或者说，是另一类佐证，颇值得我们深思：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什么？

伯力审判，对揭露日军细菌战的罪行而言，功不可没。没有这次审判，二战后对战犯的反人类罪行的揭露，便是不完整的。只是因为时间仓促，加上美国对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的庇护，这次审判是很不彻底的，揭露的事实仅是冰山一角。

但审判的对象，却只因他们的身份，便是对热爱和平的善良的人们以沉重的一击。

不妨随手拈出几个来——

川岛清：医生，细菌专家，少将军医；

梶冢隆二：医生，医务处长，中将军医；

高桥隆笃：化学家，生物学家，中将兽医；

佐藤俊二：医学博士，军医学院讲师，病理学专家，军医处长，少将军医；

西俊英：医生，细菌专家；

尾上正男：东京医科大学毕业，细菌专家；

……

这一个个，均是技术官僚、医学专家，有的还有博士学位。正因为技术上的精通，他们杀人是不见血的，甚至没有任何负罪心理，而他们只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犯中的一小部分，与大量逃脱了审判，战后把这种杀人试验成果转换为发财生意的罪犯们，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这里须补充一句的是，上列罪犯中的佐藤俊二，在被审

中完全隐瞒了在广州“波”字 8604 部队中犯下的滔天罪行，以致苏联律师在为其辩护时，竟把他在广州视为无所作为，并以此为由，酌情减刑，把原拟判的 25 年减为 20 年——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战争与罪责》的作者为此发出的锥心之问：那么日本人没有良心吗？全然没有负罪感吗？即使存在担心被周围知晓的耻辱意识，也都无论他人如何痛苦，全然不存在使自己感到痛苦的负罪感吗？而后，他自问自答：不，我不愿意这样想。在这里，我们也愿意说上一句：我们同样不愿意这么想。无论二战给中国每一个家庭造成多大的痛苦——笔者的好些直系亲人便是死在新加坡被围困的日子里，但中国人并非要复仇，他们只需要两个字——正义！历史的正义，总归要昭示于世界，也包括日本！对细菌战、大屠杀所在地的“东方奥斯维辛”——我们所说的南石头难民所的破译，是对当下日本政府和社会的一个重新认识。历史延续到今天，今天中永远留有历史的投影。如果没有顽强的社会心理与精神文化支撑，高超的医学是怎么也不会成为“东方奥斯维辛”虐杀的武器。

这里须重复一句的是，在寒带使用毒气与在亚热带、热带使用细菌战，这仅仅是自然地理上造成的差别，而其结果则并无两样。这便是我们称南石头难民所为“东方奥斯维辛”的理由。考虑到不少话语把南石头大屠杀视为“细菌战”，且杀人方式使用的“武器”为细菌，我们出于对原文的尊重，不予修改，而其性质，本书在开始时先申述清楚。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i
一、一段被沉埋得太久了的历史	1
二、诺门坎的细菌战与太平洋战争	19
三、日本法西斯在东亚制造三大反人类的重大罪行	38
四、广州—香港—广州：为什么选中的是香港难民？	58
五、浮动地狱	98
六、寻找南石头	112
七、两座炮台，不同命运	116
八、死亡工厂	121
九、化骨池与万人坑	139
十、邓岗斜、南箕路……	142
十一、杀人犯想象力	167
十二、卑鄙的弥天大谎	182
十三、731魔鬼总部	190
十四、中山医：活体解剖	205
十五、伯力审判中“波”字8604部队罪魁佐藤俊二	265
十六、日本法西斯已经寿终正寝了么？	300
附 录	314

一、一段被沉埋得太久的历史

二十年前，当我在广州的白云山、南石头、中山医以及各大档案馆、资料馆奔走时，在一片迷茫与沉重，以及剜心的痛楚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这是一段被沉埋得太久的历史——整整半个世纪！

这也是一个太沉重，沉重得已让人忘却了的人间悲剧——忘却本身，更是悲剧！

所以才用得上“追诉”这个字眼。这不仅仅是对那么一桩惨绝人寰的滔天大罪的追诉，也是对我们这种“健忘”的可悲天性的一个追诉。

时至今日，当我提笔写下这个标题之际，却已经有人在耳边鼓噪，什么“热点”呀，“主旋律”呀，“过时了”呀。可是，这么一桩罪行，分明是近日才得以较充分地揭露——莫非，当一个历史事件得到揭示时，其发掘出的意义反而会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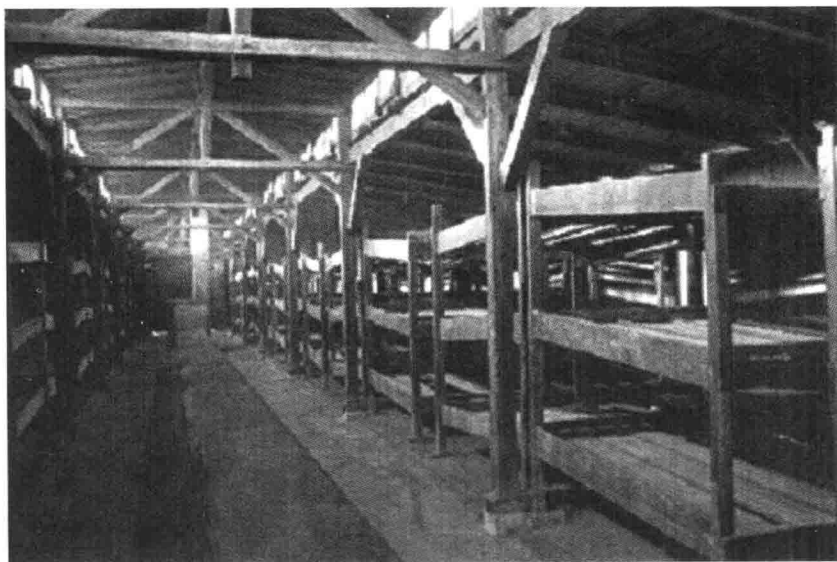
相信，这一追诉并不曾失去时效，哪怕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于是，我不仅写下了这个标题，而且接受了广州电视台的约请，专为此题材写一部“过时了”的电视连续剧。

为的是——历史的追诉！



► 奥斯维辛集中营正门，当年德国法西斯用火车将囚犯直接送进了这个大门。

我之所以用上“东方奥斯维辛”这么一个代名词，并不是为的耸人听闻，以引起传媒与读者的关注，而是事实本身就是这样。在南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确存在这么一个地方——它在广州的南郊，珠江的弯曲部，它的名称叫“南石头难民收容所”。老百姓叫它“收命所”“刚人场”，正如在欧洲一样，老百姓把那些称之为“劳动之家”的“保护所”“集中营”称之为“死亡营”。“大批香港难民”就在这人间蒸发。



► 奥斯维辛集中营囚房



► 奥斯维辛集中营密布的电网

但问题在于，对德国法西斯这类杀人机器，70年来，一直有人在追踪、调查，写出了一部部的学术著作，揭露了大量的屠杀罪行，有详尽的统计材料与具体的数字。相比之下，日本法西斯的罪行，却由于种种原因，70年来仍未得到彻底的清算。

二战中，中国的伤亡，是欧洲战场上的一倍半还多！“大批香港难民”——大批到什么程度？迄今，仍未能拿到准确的数字，也许很难再拿到了。不似德国法西斯的一些集中营，还有名单可查，打印好，编纂成册，我们至今仍可以从一部部研究著作中找到，从若干影视资料中看到。日寇毁掉了一切罪证，虽然难民离港前少不了登记、申请、审核等手续，可现在却无法查找，据称是“烧毁”了。

我们只知道，香港在沦陷时有 150 万人口。

到日本投降时，只剩 60 余万人了。90 万人是作为难民逃亡了的。